

第 1 章

自我批判时代的豪杰

翻开晚明学者的一些著作，经常可以看到“天崩地解”和与之相类似的话。^①当然，更为流行的是黄宗羲的“天崩地解”，时贤们喜用此语来概括明末清初的社会情况。这是黄宗羲晚年在海宁讲学，批评心学、理学的空疏学风时说的：

奈何今之言心学者，则无事乎读书穷理；言理学者，其

^① 东林党人顾允成在万历年间惊呼：“吾叹今之学者，凭是天崩地陷，他也不管，只是讲学耳！”（《明儒学案》卷六十《东林学案三》）宋明理学的殿军刘宗周，明知大明王朝无可挽救，仍“欲以垂尽之躯，扶天崩地坼之业。”（《刘子全书》卷四十《年谱》）流亡东瀛的朱舜水有类似的见解：“如崇祯末年，缙绅罪恶贯盈，百姓痛入骨髓，莫不有‘时日曷丧，及汝皆亡’之言。故流贼至而内外响应，逆虜入而迎刃破竹，惑其邪说流言，竟有前途倒戈之势；一旦土崩瓦解，不可收拾耳。”（《朱舜水集》卷一《中原阳九述略》）再早一些，嘉靖间松江名宿何良俊，担心“民不土著，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。”（《四友斋从说》卷十三《史九》）

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，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不违。……天崩地解，落然无与吾事，犹且说同道异，自附于所谓道学者，岂非逃之者愈巧乎？”（《黄宗羲全集》第十册《留别海昌同学序》。以下凡引《黄宗羲全集》者，简称《全集》，标明册数和篇名）

词语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、政治、思想与文化的象征，现实生活的变化常常会催生出许多新词语。士人们竞相使用相类的新词语，反映的是不同阶层的不同见解。黄宗羲与顾允成是从学风的角度说的，强调学术应联系现实；刘宗周与朱舜水是为大明王朝存亡着想的，是对明末社会内外交困情况的概括。何良俊是从明正德、嘉靖年间，去农而改为工商的人数倍于前，农民不再固守在土地上的情况，重农轻商的传统受到挑战而忧心忡忡的。东林党人是地主阶级的在野派，刘宗周是大明王朝的坚决拥护者，朱舜水和黄宗羲则为启蒙学者。何良俊是一个对当时现实极为不满，但又不希望明王朝走向崩溃的补天派。“天崩地解”和与之相类字眼的频繁出现，表现不同时期、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，对明末社会持有一致的看法，表明中国封建社会在明末已经进入了马克思所说的“自我批判时期”。这是一个动荡不定的时代，也是思想家辈出的时代。社会的动乱，有助于摧毁旧的秩序，以往一统人们思想的专制主义会受到冲击。原先的禁锢松懈了，言论就显得相对自由些，这为文人学者的显山露水提供了各种机会。社会的动乱，迫使有着强烈责任感的思想家们，深刻地思考现实中的种种问题。他们要求变更现状，并就此发表己见、相互交流，于是不同的学说就面世了。黄宗羲认为，这样的时代必然会造就英雄豪

杰出来：“天生豪杰，为斯世所必不可无之人。”（《全集》第十册《陈夔献五十寿序》）其实，黄宗羲就是这样一个自我批判时代中应运而生的“豪杰”。他一生的言行及其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，他的许多论著对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的影响，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。

一、自我批判时代与中国文化的金秋季节

人类社会只是到了一定的阶段才能进行自我批判，其先决条件是，社会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，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地集中在一起，但该社会尚未达到崩溃的时刻，马克思说：

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：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，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，——这里当然不是指作这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，——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。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，所谓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，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。同样，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，才能理解封建社会、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。^①

这是马克思对人们如何认识历史所下的一个比较科学的看法，包含下面三个意思：一是说，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对抗的最后一种形式，它总是把过去的社会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，

^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二卷，第 108~109 页，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。

所以对过去的历史老是作片面的理解。二是说，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充分暴露时，也即它的自我批判时期到来时，方能对以往的社会形式有充分理解的条件。三是说，在自我批判时期，人们具备了对过去作“客观的理解”的条件。

黄宗羲生活的明末清初，中国封建社会的自我批判时代来临了，这是频繁出现“天崩地解”之类词语的原委所在。具体地说，三股社会浪潮——阶级斗争与民族矛盾的并存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，作为官方哲学宋明理学腐朽性的暴露——互相交织、前后激荡而造成的“天崩地解”的现实，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自我批判阶段的标志。社会政治、经济生活与意识形态中如此深刻的危机，为人们能清晰地认识现实问题，为学者避免对以往的历史与文化作“片面的理解”提供了客观的社会条件。在自我批判时代的文化领域中，出现了一个收获季节般的景象，我称之为中国文化的金秋季节。生活在其间的一部分目光敏锐的思想家，他们凭着广博的学识与异乎寻常的思维方式，及对民族与国家强烈的责任感，在文化的各个领域，对当时现实社会中的矛盾进行概括，作出比较公正、客观、正确的结论来。这是明末清初，所以能涌现出一大批如王夫之、顾炎武、方以智、傅山、朱舜水、唐甄、李时珍、徐霞客、宋应星等中国文化史上伟人的原因。他们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峰，诚如王夫之所说：“学成于聚，新故相资而新其故。”（《周易外传·系辞上传第四章》）。历来被称为明清之际“三大家”之一的黄宗羲，又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与一大批文化史上的伟人相呼应的是，《船山遗书》、《日知录》、《物理小识》、《通雅》、《霜红龕集》、《朱舜水

集》、《潜书》、《徐霞客游记》、《本草纲目》、《天工开物》等等一大批扛鼎之作问世了。其间，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、《明儒学案》、《宋元学案》、《易学象数论》等著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。

为什么一个社会在行将衰败时，却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呢？因为精神生产的一定的繁盛时期，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正比的，其间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。春秋战国时期，社会动荡到了极点。“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；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在这充满血污与争斗的时代里，中国文化却大放异彩，远远胜过汉唐。汉唐的恢宏气势与强盛的国力，是春秋战国时代无法比拟的。但就精神生产而言，先秦却是百家争鸣、诸子蜂起的时代，不同主张相互碰撞，为中国文化奏起了壮丽的乐章。先秦诸子的学说，是中国文化的源头，他们的著作是炎黄子孙经常回眸和发掘的对象。唐代基本上没有什么大思想家，哲理色彩较浓郁的，且作为代表人物的，只是韩愈、柳宗元等人，这是个不争的事实。相对于汉唐，先秦可以说处于不发达的阶段。自汉代以降，就整体态势而言，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，再加上大一统的格局已基本确立，自然不需要百家争鸣了。尽管汉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论，唐有儒、道、佛三教相互辩驳的情况，但同产生了众多学派的先秦，还是要逊色得多。

明代的前期与中叶，社会的发展还是相对稳定的，各种矛盾并未充分暴露，人们对之缺乏比较深刻的认识是完全正常的。到明末，社会处于极度的动荡不定之中，时人以江海中行驶的“漏舟”喻之：“方今时势，如御漏舟行江湖中，风波正急，舵师拱手，兢兢业业，协心共济，犹冀免溺，稍泄玩必不幸矣，况可袖手而

诟谇乎 庙堂隐犹 无大于此。(冯梦龙：《甲申纪事·自序》)冯梦龙说的情况，其实从万历年间就开始了。^①自万历到崇祯，明王朝这只“漏舟”，一直苦苦挣扎于汹涌澎湃的社会危机的波浪中。后金之勃兴，“三饷”之加派，民变之激烈，起义之频仍，致使四海震撼，败象环生。与这种持续性的社会政治危机相呼应的是，作为占有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——宋明理学的腐朽性异常明显地呈现在人们面前。在阶级斗争激烈、民族危难空前之际，无论是程朱理学，还是陆王心学的信徒们，尚在说玄道虚、空谈心性修养。那种“落然无与吾事”的态度，说明理学的信徒没有社会责任感，是学问与现实相脱离的表现。一个社会的矛盾暴露得愈是充分，人们对它的认识就会愈加深刻，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规律。明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生，使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启蒙学者，形成与传统大相径庭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，从而为他们深刻认识自我、批判时代的社会危机，提供了必要的经济背景。我想，这是明清之际启蒙学者成群出现、扛鼎之作层出不穷的原委所在吧！

二、“冷风热血，洗涤乾坤”

青年时代的黄宗羲，是一个勤奋好学、血气方刚的奇男子。他与阉党斗争的事情，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

^① 陶望龄，一位小有名气的文人，也把明王朝比作为“漏舟泛江湖”：“方今时势，如漏舟泛江湖，犹幸无事，濡衣褐，解幙被，叫呼狂顾，塞此溃彼。假令风济彼解，犹幸无事，万分有不幸，冲飙狂涛，又震击之，虽有童昏之人，犹知其难也”（《歌庵集·因早修省陈言时政疏》）

正当他孜孜不倦地沉浸于经史之学时，父亲黄尊素为阉党所害。黄尊素早年与东林党人并无往来，后居京都，始与杨涟、左光斗、魏大中等人交往。黄尊素的寓所，便成了东林党人的活动据点之一，他又多次上书揭露魏忠贤一伙的罪行，故而被削职还籍。这样，黄尊素自然成了阉党的眼中钉。天启五年（1625），黄尊素与周宗建、周昌顺、缪昌期、李应升、高攀龙、周起元等七人一起蒙难，史称“七君子”。这对十五六岁的黄宗羲来说，是一个极为强烈的刺激。祖父黄曰中，“于羲出入之处，大书‘尔忘句践杀尔父乎’八字，揭之于壁。”（《全集》第十册《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略》）他的母亲姚太夫人，要黄宗羲时刻不忘祖父的教导。于是黄宗羲一边苦读，一边习搏击技术，准备为父报仇。天启七年（1627），熹宗死，崇祯即位。欲励精图治的明思宗登基后，先拿魏宗贤一伙阉党开刀。黄宗羲觉得雪冤的时日来了，便在袖子里藏了锥子，身上带了写好的奏疏，同东林党人遗孤一起，入京诉冤。是年5月，刑部会审阉党许显纯、崔应元。当堂对簿的黄宗羲，出所袖锥子击许显纯，许显纯被击得流血遍地。黄宗羲还同周宗建之子周延祚等人一起处死了刽子手叶咨、颜文仲。当年罗织黄尊素罪名的李实，以三千两百银塞给黄宗羲，要黄宗羲不出廷对质。黄宗羲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，并奏明崇祯帝。此后黄宗羲偕同遇难子弟，设祭于狱门外，告慰先辈忠魂。秋天，扶父亲灵柩南归。

这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，而是东林党人与阉党斗争的继续。对这一人们所熟悉的史实，有必要作历史与文化学上的诠释。因为为人们所熟知的事情，恰恰是他们所不去探究的，从而难以得到真知。

皇帝无实权，大权旁落至外戚、母后、宦官、权臣手中，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常见的。明朝宦官势力坐大的，前有刘瑾，后为魏忠贤，比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。《玉镜新谭》卷一记录了魏忠贤阉党权势熏天的实况：“一切政事先请呈崔（呈秀）公，而又托词云，要与里边（指魏忠贤）说可否定。举朝但知有此二人，而不知有圣上。威福日盛，鹰犬日众，四方孔道，民间无一敢有偶语者，驿使停驂，即卧榻间无一敢提魏字者。”魏忠贤当道的时期，实为有明三百年间最为黑暗的日子。

宦官本为皇帝的奴才，本非一种政治力量。当皇帝感到孤独无援时，往往会倚重于这一批日常生活中最近自己的奴才。文韬武略不是宦官之有显赫地位的必备素质，宦官能够擅权是因为他们扮演了忠实卫士的角色。宦官可热炙一时，但基础是脆弱的，只能随皇帝的宠幸与否来定夺。宠幸随皇帝的意志而定，所以必然要趁皇帝健在并得宠之时，拼命窃取权势，搜括财物。一旦原先的主子，不能再分残羹给宦官时，宦官会毫不犹豫地另择新主。就像狗一样，谁给他们肉吃，谁就是他们的主人。但他们又不像狗那样，会牺牲自己乃至生命，去给施过恩的主人效忠拼命。无论主子怎么相信他们，待他们多好，倘或他们感到主子有些儿不稳，立刻会脚踏两只船，望风转舵，甚至于投到主子的敌人的怀抱里去。宦官比一般的官僚，有着更为强烈的贪婪性。他们的人格是卑下的，他们是无所谓气节和尊严的。

东林党人在反宦官的斗争中，是极有骨气的。东林党人坚决主张革新朝政，反对矿监、税使对民众的横征暴敛，要求惠商恤民、减轻赋税，重视手工业、商业的发展，基本上体现了地主阶

级改良派和中小商人与市民的利益。尽管东林党人过多地把主张的实现寄望于皇帝身上，但他们为官清廉，严于律己，与一般以权谋私的官僚有天壤之别。与魏忠贤及其爪牙相较，东林党人是黑暗之中的一线曙光，是正义与希望的所在。据陈鼎《东林列传》记载，“虽黄童、白叟、妇人、女子皆知东林为贤。”“每罢官归里，若破车罢马，残书数簏，乡党卒以为贤，愿与约婚姻，结金兰，相与往来不倦。”这是他们有骨气的一个方面。另一方面，到生死关头来临之际，他们不怕丢官，不怕严刑，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。因李实诬奏入狱而受害的“七君子”，除高攀龙在缇骑到家前沉水自尽外，其余六人皆在牢狱中受酷刑致死。如黄宗羲所概括的：“熹宗之时，龟鼎将移，其以血肉撑拒，没虞渊而取坠日者，东林也。”（《明儒学案》卷五十八，《东林学案一》）中国文化史上有两次士人与宦官大规模的对抗行动，一在东汉，一在明末。在与宦官这一腐朽势力的抗衡中，东汉士人、东林党人是统治阶级中的鲠直派，他们对民众抱有同情心，他们富有正义感，代表着社会上追求光明的人们的愿望。作为东林党人后人的黄宗羲，其与阉党的斗争，既有为私报仇之处，也是正直善良的人们同社会中黑暗势力斗争的体现。

东林党人的高风亮节，博得后世人们的景仰，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^①黄宗羲颂扬东林党人的骨气时说：

数十年来，勇者燔妻子，弱者埋土室，忠义之盛度越前

^① 1962年11月，董必武同志参观东林书院后题诗：“东林讲学继龟山，高顾声名旧日传，景仰昔贤风节著，瞻楹履闾学弥坚。”东林党人在后人心目中，是社会正义的代言人，是同社会黑暗势力作斗争的楷模。

得个被捕入狱的结局。同时落入阮大铖手中的，还有顾杲、陈贞慧等人。顺治二年（1645），清军打进南京，弘光政权覆亡。南京城中大乱，黄宗羲等人伺机脱逃。到了浙东，黄宗羲投入了抗清斗争的行列中。

结社，是明代极为流行的时尚。黄宗羲不仅是复社的骨干，而且还参加了杭州的读书社、南京的国门产业社、宁波的文昌社，与许元溥等人组织抄书社。此外，他还与杭州的登楼社、余姚的昌古社、石门的澄社的成员们有联系。黄宗羲对此类事情，在文章中是以赞颂的口气道及的：

崇祯间，吴中创为复社以网罗天下之士，高才宿学多出其间。主之者张受先、张天如。东浙冯留仙、邨仙与之枹鼓相应。皆喜容接后进，标榜身价，人士奔走，辐辏其门。……其间楷模之人，文章足以追古作，议论足以卫名教，裁量人物，讥刺得失，执政闻而意忌之，以为东林之续也。（《全集》第十册《刘瑞当先生墓志铭》）

从这段话中，可以知道复社是怎样由一个诗文结合的团体，发展成为具有政治斗争性质的组织了。结社对黄宗羲文化品性的形成影响是很深的。他的气节观，包括与社会黑暗势力宦官抗争时的正义气概，和国破家亡时坚持民族气节，及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的形成，均与黄宗羲结社活动有直接的关系。为此，有必要从文化史的视野作一番探索。

“社”这个名词，是与先民的宗教活动相关的。《说文解字》“社”字下云：“地主也，从示土。”民众祭祀其所居住地方的神祇，土封以为记号，那就是社。汉代有乡社、里社的名称，可见社为

一地之主，引申为社会的组织。后来文士结合的团体叫做社，像晋代的莲社，宋代胡瑗的经社，都可以说是明代结社的起源。结社，是明代士大夫以文会友的事情。在社中既可学习时艺，也可选择知己的朋友，故而是极为繁盛的。这种繁荣的景象，与科举制度息息相关。一般士子们集合起来习举业、作团体的运动就是社。黄宗羲说：“当崇祯初，士之通经学古者，其私试之经义，皆标以社名，极众人之炫曜。”（《全集》第十一册《诸硕庵六十寿序》）复社是当时规模最大、影响最广的一个社，据记载复社的成员达 2025 人。成员的地域，先是在江南地区，后蔓延到赣、闽、鄂、黔、鲁、晋等地。陈去病《五石脂》，说及复社的盛况：“松陵士大夫家，咸置一舟，每值集会，辄鼓棹赴之，瞬息百里，不以风波为苦也。闻复社大集时，四方士子之拏舟相赴者，动以千计，山塘上下，途为之塞。”黄宗羲是复社的骨干，他对复社由习举业的团体，演为具有政治性质的组织，有清晰的认识：

集士子私试之经义而刻之，名之曰社，其事至浅鲜也。本体仁当国，小人之攻东林者蔓延及于复社，作为《蝗蝻录》，言东林之有复社，犹蝗之有蝻，所以传衣钵者也。士子得此，声价顿高，于是复社之名。俨然如“俊、及、顾、厨”之于天下。（《全集》第十一册《钱孝直墓志铭》）

为着应付科举考试而成立的社，在黄宗羲看来，并无什么深刻的内涵。崇祯初，温体仁为内阁大学士时，排斥姚希孟和文震孟，而这两人是崇祯朝东林党的闻人。于复社，温体仁多方设法箝制之。这样一来，复社士子反而身价大增，扬名于天下。“小人”，是指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以及一批贪图利禄、丧失人格、追

随阉党的阁臣、官僚与爪牙。黄宗羲这一用语是完全继承了东林党人“衣钵”的。^①“俊、及、顾、厨”等字的使用，是黄宗羲以东汉末年的名士来比喻复社的“士子”。一般的士人在名士受迫害时，常常谋设权计，使得逃隐。被列为“八俊”之首的张俭，在逃避宦官的追捕中，人们“莫不重其名行，破家相容。”（《后汉书·党锢列传》）“俊”为才能出众、有名望；“及”为能引导人、受崇仰之意；“顾”指能以自己的德行影响别人；“厨”指能散财救人急危之意。与宦官抗争中，一些名士被冠以“八俊”、“八及”、“八财”、“八厨”等美称。其中郭林宗、范滂、李膺、杜密等名士，都是被后世视为值得效法的。黄宗羲以复社士子比作东汉的“俊、及、顾、厨”，表明他是东汉士人的气节观的继承者。东汉士人在与社会黑暗势力的斗争中，其无所畏惧、敢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境界，是他们的人格价值获得社会认可和后世推崇的基本前提。守节者荣、失节者耻这一观念深入炎黄子孙的心田中，是同他们与宦官抗争中表现出来的杀生成仁、舍生取义的气概分不开的。余英时在论及东汉士大夫时说：“若贯通全部文化史言之，则其根本精神上承先秦之士风，下开宋明儒者之襟抱，绝不能自阶级利害解释之。”在脚注中又举了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、二程与朱熹与东汉士大夫名节的推许，以及顾炎

^① 东林党人，以是否坚持气节来界分君子与小人。君子是指关心国事、同情百姓、对朝廷腐败之事敢谏敢言的官吏和文人士。清人秦松龄论及东林党人首领顾宪成时说：“先生在吏部惟以进君子、退小人为务，不憚与执政忤。至得罪而去，虽居林下犹与当路者反复别白言之。天下是知君子、小人之当辨，名节之当重”（《顾文端公年谱序》）

武在《日知录》中“依仁蹈义，舍命不渝”的赞扬来证实。“宋明儒者深有契于东汉士大夫之精神，由此可见一斑。”^① 如果从社会群体的角度来说，“依仁蹈义，舍命不渝”气概承继者是明末的东林党人与复社士人。黄宗羲的母亲，知其子因上书而遭祸时，以东汉士大夫魁首范滂之母自况，自是东林党人受东汉士人气节观影响的一个侧面。^② 我以往读到“忠义之盛，度越前代”的话，唯觉得遣字之妙，而很少从“文化史贯通的角度”去思索。其实，此话为黄宗羲与他的复社朋友们，以鲜血浇成的亲身经历的升华。只要读一下已故史学家柴德赓《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》，是不难有此感受。^③ 该文统计，在《留都防乱公揭》上签名的有 143 人。其中东林党人子弟与天启被难诸家后裔共 22 人，如顾杲（顾宪成孙）、周茂兰与周茂藻兄弟（周顺昌子）、左国柱兄弟 4 人（左光斗子）、文乘（文震孟子）等。在抗清斗争中死亡者有 6 人，如吴应箕、黄淳耀等。^④ 因事累为清室所获殉义者 7 人，如文乘、侯歧曾、陈子龙、沈士柱等。辅南明诸王图复兴者 5 人，如冯京第、黄

① 余英时：《士与中国文化》第 295 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。

② 黄宗羲在南京，被阮大铖抓进监狱的消息传到家中后，其母叹曰：“章妻滂母，乃萃吾一身耶！”（全祖望：《梨洲先生神道碑文》）西汉王章上书，言王凤不可用，为王凤所陷害，下狱死。东汉灵帝时，大诛党人，范滂自诣狱，滂母与之诀别。宗羲母想及夫与子，皆遭陷害下狱，真可谓“章妻滂母”集于一身关于东林党人对东汉士大夫精神的承继，可参阅朱义禄：《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》第 406—414 页、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。

③ 柴德赓：《史学丛考》第 1—49 页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。

④ 黄淳耀与侯歧曾，坚守嘉定城，抗击清兵。二人的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，抗日战争期间，嘉定人民树一石碑，以纪念黄、侯二人的方式，来激励人们抗日救亡的情绪。笔者于 1997 年 11 月到嘉定县城，见此碑仍在汇龙潭公园内耸立着。

宗羲与恽日初等。国亡自尽者 2 人，为魏学濂和陈元纶。该文只写了一半，故列了“仕清者”、“为僧者”、“本不入仕者”与“国亡后隐逸者”等目，而未见对应的文字。这些人中，不少是黄宗羲的好友。

他们的事迹或见于《思旧录》，或见于黄宗羲的诗文中。他们在民族危难之时，坚持了民族气节，对后世影响是很深的。“月表有人留季汉，应知俗论不能糊”（《全集》第十一册《南雷诗历·哭沈昆铜》），这是黄宗羲对好友沈士柱的悼念诗句。月表，按月记事之表，《史记》有《秦汉之际月表》。黄宗羲的意思是，沈士柱完全是有资格在青史留名。因为沈士柱以其“依仁蹈义”的气节，是继承了东汉末年士大夫的精神气概的。甲申之变，黄宗羲师友中殉节的有刘宗周、范景文、倪元璐、文震亨、祝渊、徐石麒、祁彪佳等。从师友的交往对人的影响而言，师友们的行为对黄宗羲产生影响是不小的，这是黄宗羲坚守气节不仕清朝的原因之一。

社会交往，对个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。在茫茫人海中，人们寻觅知音、朋友和师长。社会交往对个体来说，是一种基本而必要的活动。在交往活动中，人们通过往来，自己影响别人，反过来也受别人的影响。社会交往，对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。在这方面，柳宗元提出过“师友以成以增”的观点：

今之世，为人师者众笑之，举世不师，故道益离。为人友者，不以道而以利，举世无友，故道益弃。呜呼！生于是病矣，既以傲己，又以诫人。不师如之何，吾何以成？不友如之何，吾何以增？……道苟在焉，佣丐为偶。道友以是，公侯以走。（《柳河东集》卷十九《师友箴》）

柳宗元对当时不愿从师、以利交友的恶习作了批判之后，认为人的成长重要途径之一，就是要靠师友的帮助和教育。“道”之所在，就是拜师交友的原则。只要有利于“道”的实现，即使是“佣丐”也应该和他们在一起，不能以贵贱等级来划界；相反，公侯贵族若有悖于“道”的话，也不妨离开。从一个人的成长道路来说，师友的指导和帮助是一个重要的因素。师友是人的社会活动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任何一个人的健康成长，都离不开师友的帮助。朋友的点拨往往使人少走弯路，师长的教诲使人正视缺点而趋于完美。师友们的举动，常常铭刻在自己的心坎里。人的成长和发展，师友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。柳宗元以为，人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，师友起到了“以成以增”的作用，是有见于人的成长普遍规律的。这么多的师友，在民族危难中的“依仁蹈义，舍命不渝”，这除了对黄宗羲坚守民族气节有深刻影响外，还渗透到黄宗羲诗文创作中去。一如《南雷诗历题辞》所说：“天地之所以不毁，名教之所以仅存者，多在亡国之人物，血心流柱，朝露同晞。”（《全集》第十一册）《南雷诗历》实为一部诗史，其间，表彰了刘宗周、祝渊、张苍水、陈子龙等人从容就义、壮烈殉难的事迹。至于他在传记、碑、铭中，为这些忠贞节义之士所作的赞扬，更是不胜枚举了。

三、冥搜博览的“读书种子”

黄宗羲对中国文化典籍的喜爱，可能是从通俗的演义小说开始的。他在晚年回忆母亲时说：“宗羲此时年十四，课程既毕，窃

买演义，如《三国》、《残唐》之类数十册，藏之帐中，俟父母熟睡，则发火观之。”他的父亲黄尊素知道此事后，并未收书禁之。“禁之则伤其迈往之气 姑以是诱其聪明可也。”（《全集》）第十一册《家母求文节略》）黄尊素意思是：强行禁止他读小说，会损伤他的求知欲的，还是以此来启发他的智慧吧！

他的弟弟黄泽望是跟他学习的，黄宗羲在悼念其弟壮年夭折时说：

泽望少无师，以余为师。余初读《十三经》，字比句栉，三礼之升降拜跪，宫室器服之微细，《三传》之同异，义例、氏族、时日之杂乱，钩稽考索，亦谓不遗余力，然终不及泽望之精。冥搜博览，天官、地志、金石、算数、卦影、革轨、艺术、杂学，盖无勿与予同者。”（《全集》第十册《前乡进士泽望黄君圻志》）

第一次与阉党斗争之后，他遵父命，拜刘宗周为师，发愤攻读经史：

忆余年十九、二十岁时，读二十一史，每日丹铅一本，迟明而起，鸡鸣方已，盖两年而毕。（《全集》第十册《补历代史表序》）

说不及其弟“之精”，当为自谦兼为死者溢美。从这两段话来看，黄宗羲对经史之学，是“不遗余力”的；对天文、地理、算数、金石、艺术、易学与杂学，则极尽“冥搜博览”之力。“不遗余力”的“冥搜博览”，体现在黄宗羲的访书活动中。从青年时代他就持续不断地访书、读书，目标是要做一个“读书种子”。黄宗羲有一方藏书章，印文为：“忠端是始，梨洲是续。贫不忘买，乱不忘携。